

戴高樂與歐洲共同市場

吳圳義

——一九六五——六六年危機之探討——

(作者為本校文理學院歷史學系專任副教授)

戴高樂於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七年兩次否決英國進入歐洲共同市場的申請，固然會導致此一西歐經濟組織各會員國間互存芥蒂；但是對它構成最大威脅的，則是一九六五——六六年間的危機。這次危機起源於經濟性的農業問題，可是最後却演變為政治性的問題。費盡多少心血才建立起來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歐洲共同市場的正式名稱)，幾乎因戴高樂所製造的這次危機，而面臨解體的厄運。現從危機發生前的共同農業政策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問題、危機的起因、危機的經過、危機的結束和影響等方面來探討，以瞭解此一危機的前因後果。

一、危機前的共同農業政策問題

普萊斯 (Roy Pryce) 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關稅聯合和經濟聯合」(Customs union and Economic union in the E.E.C.) 一文中，提到共同農業政策的形成，曾是共同體的中心議題，而且也是重大政治困難的主題。^① 真的，在一九六五——六六年危機之前，農業問題已成爲共同市場會員國，尤其是德、法兩國間，爭論最激烈的問題。

根據羅馬條約 (Treaty of Rome) 第三十八款之規定，「共同市場將擴展到農業，以及農產品的貿易」，「在條約生效兩年內，理事會 (Council) ^② 在委員會 (Commission) ^③ 的提議下，以有效多數票，決定何種產品應劃入共同市場的貨物表。」^④

在第三十九款，還明列共同農業市場的目標如下：^⑤

(1) 以促進技術進步和保證農業生產的合理發展，以及所有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力的最適當利用，來提高農業生產力；

- (2) 保證農業界相當高的生活水準，尤其是農業生產者個人收入的增加；
- (3) 穩定市場；
- (4) 保證供應；
- (5) 保證以合理價格提供消費者必需品。

從條約本身來看，歐洲共同市場的確有意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只是未把它和工業視為同等重要和同等迫切，以致於受到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猛烈抨擊。

羅馬條約曾建議兩項暫時性農業措施——最低進口價格和長期貿易協定，並且還要求委員會召開農業會議。一九五八年七月在斯特列薩 (Stresa) 召開的農業會議，其最後決議案建議採取一種共同價格政策，取消有違條約精神的補助，改善農業結構，以及維持歐洲的農業家族制度。委員會有關共同農業的建議案，是在一九五九年由負責「農業總署」(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griculture) 的五修 (Sicco Mansholt) ⑥ 所領導的研究小組，經徵詢各會員國政府和農業利益團體的意見後而擬訂的。該建議的草案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提交部長理事會，正式提案也於一九六〇六月三〇日提交該會。

理事會將這個建議案轉交給「農業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其報告經理事會數次討論後，決定採取一種課稅制度 (Levy System)。這是共同體農業政策的里程碑。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始實施對工業產品百分之十，和對受數量限制的農業產品百分之五的額外減稅。⑦

對於共同農業政策的進展速度，戴高樂甚為不滿。他在「從政回憶錄」(Mémoires d'espoir) 裏，抱怨法國在歐洲共同市場的伙伴皆存有私心。她們一方面急欲盡可能降低共同對外關稅稅率；另一方面，却不急於見到共同市場六個會員國，消費和購買歐陸農產品，其中法國幾佔半數。⑧ 譬如德國所消耗的糧食，三分之二是以低廉的價格，購自共同市場之外，然後再出售其糧食供應者以德國的工業產品。所謂共同市場似乎只為工業產品而設，而西德在這方面的壓倒性優勢是有目共睹的。⑨

認為羅馬條約已經忽視法國的農業利益，戴高樂堅持在共同市場成立的第二階段，應包括農業在內。他為何如此重視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農業政策呢？

在一九六〇年間，法國政府開始承受着空前未有的強大壓力，要設法為法國逐漸增加的剩餘農產品尋找市場，並且提高其

愈來愈不滿的農民之收入。機械化和肥料利用的推廣，更有效率的耕作單位，尤其是在一九六〇年的「農業法」(Loi d'Orientation Agricole)實施以後，國家花在農業方面的補助金年達十億元，而第二和第三現代化計劃（一九五四—五七，一九五八—六一）所增加的百分之二十的農產品，更使剩餘量大增。受樂觀主義的經濟計劃者之鼓勵而提高產量的農民，現在發現他們不知如何去處置其產品。

法國政府試圖利用一種價格支持、出口補助和進口管制的複雜制度，以限制小麥、甜菜、葡萄酒和馬鈴薯的生產，並且維持農家的收入，可惜未能成功。農民所得仍然很低，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八年間，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三；而其他非農家的所得之增加，則為百分之四十六。一九六〇—六一年，農民以在公路上撒滿無法售出的產品，以自己的曳引機阻礙交通，並且在一九六一年五月進行近代法國未曾有過的農民大暴動，來表示其不滿之情。農民所得之提高，勢必依賴着法國產品新市場的尋求，而歐洲經濟共同體則提供最大的可能性。^⑩

戴高樂為法國剩餘農產品在共同體之內尋求市場的打算，首先遭到西德的激烈抵抗。當共同市場開放之時，西德每年進口的農產品，其總額年達二十五億美元。^⑪對法國來說，這本是一個很理想的市場。然而，法國農產品的價格比德國低很多，如果共同體採取低價格結構，法國不但可以供應德國在糧食方面的不足部份，甚至於還會導致效率較差的德國農民失業。

西德農民的政治力量使政府無法敞開德國市場。傳統上，農民支持基民黨(C.D.U.)；許多下議院議員代表着農村選民，事實上，其中有些議員本身還是務農呢。德國農民聯盟(The Deutscher Bauernverband)為歐洲最有力的壓力團體之一。農民票的失去，可能意味着基民黨在大選中的失敗。

當戴高樂在一九六一年後半年遇到德國的抗拒時，他指示在外長墨維勒(Couve de Murville)領導下的法國代表團表明，如果法國的意見未獲同意的話，法國將離開歐洲經濟共同體。在布魯塞爾(Bruxelles)關鍵性的辯論前夕，他寫信，隨之又電告西德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 1876-1967)，肯定此一最後通牒。^⑫經過一百四十小時漫長的討論^⑬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六國的部長理事會終於達成協議，使農業正式進入共同市場。^⑭

此一有關歐洲經濟共同體共同農業政策第一階段的協議，由法國外長墨維勒簽字，並於一月十七日獲得法國政府的同意。

協議本應從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起開始生效，然而技術問題使其生效日期延至七月三十日。這個共同農業政策的主要目標如下：^⑭

(1) 利用區域性專業化、儲備和結構改革等措施來影響供應，並且利用產品品質的改良來增加需求，最後達到共同市場內部和外在的供需平衡；

(2) 以結構性和區域性的改善、土地的合併、電力的供應、良好的運輸和耕種方法、資料的服務、以及教育等等，來提高農民的所得；

(3) 以保護農民免受投機性價格波動的影響，但不使他們與國際市場長期物價波動的影響隔絕的方式，來穩定市場；

(4) 以促使加工業利用合理的或競爭性的價格尋找外面的市場，並以防止價格被邊際生產成本所決定等方式，來保證對消費者公平的供應。

如與羅馬條約第三十九款所訂的共同農業政策的目標比較，這一項的規定很顯然地較為詳盡，也較為可行。這是經歷四、五年的體驗之結果。

共同農業政策預定在七年之內（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全付諸實施，但是到了第三年如認為有需要時，尚可將過渡時期縮短為六年。^⑮現將此一政策的所有細節略為分析於后：

(1) 適用的產品—有穀類、豬肉、蛋、雞、水果、蔬菜和葡萄酒，這些農產品佔共同體農業生產的百分之五十三。^⑯後來方達成協議的有牛肉、小牛肉、米和乳類產品。^⑰

(2) 價格—除玉米外，所有的價格將在目前德國價格的最高限和法國價格的最低限之間取得協調。小麥、粗糙穀類、糖和乳類產品，將有個別的共同體市場商品組織，而且在共同體內部市場有細節性的干預，以及利用各種不同的課稅做為外在的保護。

所有這些產品的「預定」價格每年決定一次。對穀類來說，也將有一種「干預」價格，使市場商品組織為保證生產者能以最接近預定價格出售產品，而吸收市場上的餘額。干預價格的標準由各會員國自行決定，約在預定價格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十

之措。

牛肉、豬肉、雞和蛋類將無預定價格和干預價格，因此也無保證價格，只有保護國際市場競爭的安排。

水果、蔬菜和葡萄酒將受到品質管制。對非會員國的產品採用一種最低價格制度，但是萬一共同市場受其威脅時，可停止其進口，或課以一種補償稅。^②

(3) 農業基金——共同農業政策由一個「指導和保證基金」(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 給予財政資助，其經費在最初三年由會員國提供。基金的全部收入每年由理事會決定：第一年，百分之百來自各會員國國家預算；第二年，百分之九十來自會員國國家預算，百分之十來自非會員國的進口稅；第三年，百分之八十來自會員國國家預算，百分之二十來自進口稅。

在第三年終了之前，理事會要制訂保證逐漸走向共同市場制度的規則。當共同市場的階段達到時，非會員國進口稅的收入將屬於共同體，並用於共同體的開銷。

基金有三項主要功能：^③

(1) 補助高成本生產者的輸出；

(2) 市場干預，保證價格的穩定；

(3) 協助農場的現代化。

對於理事會所達成的最後協議，除德國農民外，一般的反應尚佳。在布魯塞爾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其副主席兼農業部門負責人孟修博士 (Sicco Mansholt) 於七月二十七日的記者會上報告這個新政策的細節。他描述共同農業政策的付諸實施，不但是歐洲，而且也是整個世界的重要事件。雖然仍有未可預料的困難存在，孟修博士深信，從已經發展的合作看來，所有問題都可獲得解決。^④

法國和德國也對此表示滿意，因而部長理事會一致贊成條約進入第二階段。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艾德諾總理告訴國會：「進入第二階段，將是最近數十年來歐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為歐洲已向政治聯合之實現跨出一大步。對戴高樂來說，歐洲政治某些方面的聯合似乎也是一項迫切的需要；在一九六二年春天，他再提出其六國「偉大邦聯」的計劃。^⑤

然而，權益受到影響的德國農民却表不滿。德國的生產者發現自己缺乏輸入配額、政府儲存或國家關稅的保護。他們主要的保護為高價格水準的維持，也就是對來自歐洲共同市場和其他國家的輸入品課以高關稅。德國農民聯盟準備抗拒共同市場低價格水準的建立。^{②4}

二、危機的原因

孟修博士認為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會有未可預料的困難存在，如果我們分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間之發展，可知他的所料一點兒也不差。

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在總統大選前三個月舉行的記者會中，戴高樂說法國永遠贊成歐洲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聯合，而且「七年來，我們也積極協助歐洲共同體目標的達成，：但我們曾希望，同時現在仍然希望，這是一個公平和合理的共同體。」

②5 依照公平和合理的原則，戴高樂認為一個共同體不但包括工業產品，也應包括農產品。

從戴高樂的談話中，可知他並不以一九六二年一月共同農業政策的達成協議為滿足，因為在穀價和農業基金等問題的談判，法國與其他共同市場中的伙伴之間的爭執仍相當激烈，尤其是因這些經濟問題而起的政治性衝突，如多數票決是否採行、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的職權應否擴大等，使戴高樂下定決心杯葛歐洲共同市場。現將這幾項直接或間接造成一九六五—六六年危機的經濟和政治因素略加分析。

1. 穀價問題

儘管一九六二年一月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歐洲經濟共同體理事會的決定，為共同體百分之八十五的農產品建立一項共同政策，此一政策如同「共同體農業情報處」(E. E. C.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Division)所說的，只是一個還需要填入農產品統一價格的架構而已。^{②6}

農產品統一價格的決定，關係着共同農業政策的成敗。依據一九六二年一月的決議案，除玉米外，所有其他農產品的價格將在目前德國價格的最高限和法國價格的最低限之間取得協調。如何取得協調？法、德兩國為此，尤其是穀類價格，在整個一

九六四年爭論不已。

雙方爭論的要點之一，就是法國和西德的小麥價格有很大的差異，法國農民所得的官方價格比德國農民所得的政府保證價格相差甚遠。法國政府惟恐導致通貨膨脹，不願意把小麥的價格訂高，而德國聯邦政府則反對德國農民收入的顯著減少。²⁸

來自德國的障礙仍然是農民。在德國農民聯盟主席雷溫凱爾 (Edmund Rehwinkel)、基督教民主黨農民集團和德國農業部長史瓦茲 (Werner Schwarz) 的影響下，西德總理歐哈德 (Ludwig Erhard) 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有關共同穀類價格的辯論中聲明，他無意降低一九六四—六五年德國的穀類價格。²⁹

當法、德兩國為穀價問題爭論不休之時，共同體委員會副主席，同時又是農業政策負責人的孟修博士，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四日向部長理事會提出的方案，似乎可做為解決此一問題的基準。這個後來被稱為「孟修計劃」(Mansholt Plan) 的方案，其要點如下：³⁰

(1) 從一九六四—六五年出售季節起，部長理事會為整個共同體的小麥、裸麥、大麥和馬鈴薯確定基本預定價格。最重要的產品——小麥的價格為每噸四百二十五德國馬克。因此，理事會將在前一年的八月一日以前，為每一個收成年度訂立基本價格；

(2) 在共同市場的過渡時期（亦即直到一九七〇年為止），某些會員國的農民所受到的不利影響，由共同體給予適當的財政補償。然而，自一九六六年起，這種補助將逐漸由共同體改善耕種效率和生活水準的措施取代；

(3) 除了基本的預定價格外，尚有依據主要消費地區售價而訂的一連串干預或支持的價格。

孟修計劃曾在部長理事會一九六四年五月和六月的會期中討論，皆因德國拒絕接受聯合穀價而無法達成協議。法國為此非常不滿。法國總理龐畢度 (Georges Pompidou, 1911-1974) 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表示，聯合農業市場對於共同市場來說是必須的，法國決不同意一個只有聯合工業市場，而無聯合農業市場的事情出現。羅馬條約對於農業的規定並不完善，為此，三年來法國政府不斷被迫重複法國不會同意一個沒有共同農業市場的「共同市場」。³¹

在本國農民的強硬壓力下，德國政府曾拒絕委員會有關德國小麥價格降低到接近這些價格與法國低價格平均數的建議。然而，在面對着其他會員國的壓力，尤其是來自戴高樂總統退出共同體的威脅，德國最後只好讓步。³²

經過一次聯邦內閣會議，以及十一月三十日歐哈德總理與有關部長、基民黨和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領袖、德國農民聯盟代表等討論之後，經濟部長史穆耶克 (Schmidler) 於十二月一日告訴共同體部長理事會，德國將接受統一穀類價格，建議以小麥每噸四百四十馬克的價格，取代西德原先要求的四百六十馬克和「孟修計劃」的四百二十五馬克。^⑳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共同體部長理事會為從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起穀類共同價格開始實施一事達成協議，並且同意成立調節農業的共同基金。誰知此一農業基金問題，又成為共同市場會員國間爭論更激烈的問題。

2. 農業基金問題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的部長理事會就已決定，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以前，由農產品進口稅和各會員國的分攤，逐步完成共同農業基金的規則。此一計劃又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部長理事會一再強調。然而，由於法國在共同市場的伙伴拒絕履行此一承諾，因而導致危機的爆發。

戴高樂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的記者會，以及在十二月十四日總統大選前接受記者杜阿 (Michel Droit) 電視訪問時，皆表示共同市場的其他會員國未能按時解決農業基金問題，為法國拒絕參加部長理事會的主要原因。^㉑

法國新聞部長貝爾斐特 (Alain Peyrefitte) 代表內閣發言，他說：

「內閣為預期三年，也就是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三十日，完成財政安排的協議未能履行感到遺憾。它瞭解歐洲經濟共同體已因此陷入使一切更須慎加考慮的危機，因為就是為了這些財政安排，法國政府才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同意讓羅馬條約進入第二段，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有關共同穀價的決定才能達成，……」

「既然法國代表團建議，法國分攤某些其他共同體會員國認為過份的財政負擔，而且也同意於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工業產品達到完全的關稅聯合，此一危機的發生是最不應該的。」

「由於這些情形，(法國) 政府已決定承認新情況的經濟、政治和司法的後果。」^㉒

農業財政政策未能達成協議，為戴高樂及其政府視為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表面的原因。^㉓ 根據大多數歐洲共同市場觀察家的看法，這根本是一項技術性問題，而且根本不必造成危機就可以解決。^㉔ 由此可知戴高樂製造危機

的原因，還是以政治性的成分居多。

3. 戴高樂不願法國失去部份主權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部長理事會，除了決定成立共同農業基金外，還要求共同體委員會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以前，提出有關一九六五—七〇年間應該如何資助共同農業政策的建議案。因此委員會於規定日期向理事會提出下列三項建議案：^③

(1) 一項資助共同農業政策的新規則；

(2) 共同體本身的經費取代會員國財政分攤的安排；

(3) 羅馬條約第二〇一和二〇三款之修訂。

上述建議案不僅重提農產品的課稅，而且還提到這些稅和工業進口稅應該交給歐洲經濟共同體做為基金。由於這是一筆巨額的款項，而且成為共同體的財政收入，委員會建議，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④ 的權限應該擴大，以決定共同體的收入，同時也應獲得對於共同體的預算有較大的權力。委員會認為這些不侷限於農業問題，又能使共同體財政自主的建議案，使歐洲的統一向前跨出重要和決定性的一步，因為此後共同體有屬於自己的收入，而其支出也將由共同體決定，其中歐洲議會將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此外，部長理事會將以絕對多數票決取代一致票決，^⑤ 換句話說，單一會員國不再享有否決權。

對於委員會的建議案，荷蘭國會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決議案表示支持；荷蘭外長龍斯 (Luns)、西德外長史洛德 (Gerhard Schröder)、意大利外長范華尼 (Aminore Fanfani) 也一致贊同。

法國外長墨維勒適為部長理事會輪值主席，他激烈反對委員會的建議案，並且認為委員會所提的政治條件，法國完全無法接受。現在唯一要解決的是六月三十日既存農業財政規則失效後的課稅問題。此時，比利時正處於內閣危機，史巴克 (Paul-Henri Spaak) 以個人身份表示，農業財政規則必須如同法國所要求的，在六月三十日以前重訂，而其他由委員會提出的意見可在以後處理。^⑥ 法國的反對意見，因此可以說也獲得半票的支持。

法國為何要反對委員會的建議案？戴高樂認為在這些建議案中，以部份財政主權移至歐洲議會和否決權的喪失為法國所最

無法忍受。

很顯然地，戴高樂在共同市場製造危機，就是拒絕放棄任何法國主權，或者允許有關農業的政治性政策受到一個共同市場組織的任何控制。^{④②}依照委員會的建議，各會員國必須放棄部份財政主權，使歐洲經濟共同體變成一個超國家的整體化組織。^{④③}

委員會所提到的預算，為數高達兩百億新法國法郎，各會員國從其納稅人手中提出這筆龐大的經費，自己無法支配，而要交付歐洲議會審核。然而，該議會基本上只具諮詢性質，如其橫加干預，則將更增加事情的嚴重性。^{④④}戴高樂曾言及，他將干預任何有損法國自主權的企圖，^{④⑤}因此，委員會有關這方面的建議，當然被他視為對法國利益的嚴重威脅。

關於部長理事會採用多數票決的建議案，戴高樂也不會接受。依法國社會黨領袖之一，德輝爾（Gaston Defferre）的看法，此一拒絕，意指所有的決定仍然必須一致通過，換句話說，單一會員國可以使用否決權。^{④⑥}戴高樂也說：「我絕不允許多數票決。否決權是必要條件。」^{④⑦}

4. 反對委員會擅權

共同體委員會處理農業財政建議案的方式及其內容，頗令法國政府不滿。在尚未徵詢各會員國政府的意見之前，委員會就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將此一革命性的計劃交給歐洲議會和新聞界，歐洲議會並因而通過一項決議案，以示贊成。^{④⑧}

如果委員會的建議案被接受，它將變成一個擁有獨立於會員國控制的巨額收入的真正超國家行政機構。^{④⑨}受到法國激烈的批評之後，委員會主席賀斯坦（Walter Hallstein）認為這是該委員會在羅馬條約和理事會有關農業規則的規定下，追求經濟結合的權限。^{⑤①}

戴高樂製造危機的直接目標為共同市場的行政機構，尤其是委員會的角色。^{⑤②}在賀斯坦的主持下，委員會極力促成一個具有強大超國家機構的歐洲邦聯。法國政府對於委員會的擅權和野心相當反感，因而設法排除賀斯坦和孟修等雄心萬丈的人物，有意使委員會能以公僕和技術顧問的角色為滿足。^{⑤③}甚至有人認為，戴高樂有意使共同市場成為毫無任何超國家政治或經濟權威的關稅聯盟。^{⑤④}

5. 戴高樂以危機為達到目的的手段

歐洲共同市場成立後，各會員國間隨之出現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已因彼此之合作，而有了相得益彰的成果。當然各會員國都不希望這個組織受到威脅，或面臨解體。戴高樂或許甚為瞭解這種微妙關係。當他認為共同體忽視法國的農業問題時，他就利用危機以求目的之達成。例如一九六三年七月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他威脅要抵制歐洲經濟共同體，最後終於使德國和其他會員國在農業組織、農業基金和共同穀價等方面達成協議。^④在這次的爭執，戴高樂可能有意重施故技，以遂所願。

三、危機的經過

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的建議案為危機的導火線。建議案的內容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下旬向外界洩露後，戴高樂立即將不滿之情表露無遺。在三月底，法國迫使原訂五月召開，以政治聯合為主題的會議流產。法國內閣閣員受命中止國外，尤其是到布魯塞爾的旅行。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廣播和電視演說中，戴高樂再度強調法國外交政策的獨立性。^⑤五月十三日，墨維勒告訴布魯塞爾的理事會說，不論是委員會，或者是歐洲議會，皆不得要求整個共同體的財政權力。^⑥

六月底的部長級會議為委員會的建議案爭論不休。六月二十九日，在法國的畢沙尼（E. Pisani）主持下的農業部長會議，對於農業財政問題的討論，仍未見定案。在三十日的外長會議中，西德外交部長拉爾（K. Lahr）強調，德國代表團繼續堅持共同體的三個政策——農業基金的財務，共同體的直接收入和歐洲議會預算權的增加——必須同時決定。墨維勒在答覆時，警告說，如果在六月三十日的最後期限仍未能在財政規則的修訂方面有所決定，法國將認為正式的承諾已不再被遵守，而此事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⑦這是法國的最後通牒。

經過整個晚上的討論，有關各會員國對共同農業政策經費的分攤，始終未能達成協議。在六月三十日午夜一過，擔任主席的墨維勒就宣布協調已不可能，理事會必須延期召開。在談判暫時破裂之後，法國政府於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宣布，法國撤回在委員會各部門工作的人員；法國派駐三個歐洲共同體的首席代表鮑涅（Jean-Marc Boegner）被召回巴黎。共同市場所有

重要問題的決定，為法國的「缺席」政策 (Policy of The Empty Chair) 所癱瘓。^⑤

其實，在部長理事會短暫會期的開始，墨維勒會對五國做一項重要的讓步。他宣稱，法國準備為反對共同體委員會的提議付出代價，也就是將對第三國農產品輸入課稅的時間，從原訂的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延至一九七〇年，羅馬條約為共同市場完全結合所訂的時間。此一讓步，由於會期突然結束，而未討論，但却讓人瞭解，超國家問題對戴高樂之重要性；他準備以法國的農業利益，交換委員會建議的取消。^⑥

在僵局形成之後，委員會針對造成危機的問題於六月二十二日公開一份備忘錄，其要點如下：^⑦

- (1)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獨立收入，應延至一九七〇年開始實施，因為一九六七年並不為會員國所接受；
- (2) 在一九六七和一九七〇年間，應該設立一項補貼基金，以重新分配各會員國間的進口稅收。共同體對外稅率將從一九六七年開始生效；

- (3) 現存負擔農業政策經費的制度，將仍然有效，直到「農業基金」逐漸取代由會員國負擔經費之時為止；
- (4) 關於這些建議的決定應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完成；
- (5) 新的財政規則應該與糖、動物脂肪、植物油、水果和蔬菜等尚未達成協議的共同政策之執行發生聯繫；
- (6) 對於意大利的財政支出應該設定最高額；
- (7) 在同意一九六七年為農業政策最終階段之時，會員國間關稅的完全取消，以及所有共同體進口物品的共同對外稅率的實施，也應同時生效。

從上述備忘錄可知，委員會對於財政權超國家化的意見已不再堅持，對於歐洲議會的權力也不再提及。然而，這些改變還是無法立即促使法國代表返回會議席上。

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戴高樂在記者會上談到打開此一僵局的三要件：^⑧

- (1) 六國對農業財政規則達成達議；
- (2) 委員會放棄其獨立財政權的要求；

(3)從羅馬條約刪除多數票決的條款。

對於法國的強硬態度，其共同市場的伙伴大表不滿。當意大利總統沙拉加 (Giuseppe Saragat) 於七月訪問西德時，他與西德總理歐哈德一致認為，此時對付法國的最佳策略，就是維持堅定的立場。西德外交部長史穆耶克痛恨地說：「共同市場的歷史是一部長時期的妥協史，並非單方面對戴高樂讓步。有取就必須有給。」⁶³

許多歐洲國家的政府官員也相信，共同市場將能抵擋得住戴高樂的破壞行動。法國在共同市場的五個伙伴已能同心協力抵抗他的威脅。⁶⁴

共同市場的其他五個會員國對於法國的杯葛，有意，而且也能够以牙還牙。如果需要的話，她們可以譴責法國違反羅馬條約第五款。該款規定：⁶⁵

「各會員國將避免採取任何可能損及本條約所訂目標的種種措施。」

然而她們不但不做這種使危機更加嚴重的事情，反而盡量設法讓法國能返回會議席上。處在此一困境中，比利時和意大利還是致力於僵局的打開。比利時外長史巴克要求部長理事會集會，不須委員會的參與，自己討論農業財政問題。十月，五國正式邀請法國政府參加布魯塞爾的此一會議。在法國政府口頭拒絕之後，五國代表於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在原地點集會，會後並發表下列聲明：⁶⁶

「(五國) 政府認為共同體所面臨的問題之解決辦法，必須在條約及其章程中尋找。它們深信，六月三十日中斷的談判，必須儘可能早日恢復。針對此一目的，會員國代表團檢討委員會備忘錄所提的建議。

「它們表示對基本原則的同意，並認為這些應導致談判的成功。它們指示理事會主席，將之轉告法國政府，並催促它恢復它在共同體組織中的地位。它們深信，依照共同體的議事程序，採用必須的規則，以完成在共同體平衡發展的結構中的共同農業政策，將變為可能。

獲得授權後，理事會主席，可倫坡 (Colombo) 於十月二十七日寫信給墨維勒，轉告他原來由史巴克所擬的五國代表團共同聲明的內容。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五國更進一步要求法國恢復共同體的責任。隨之，可倫坡與墨維勒於十二月八日在羅馬進行會談。雖然法國未出席十二月二十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部長理事會，烏爾利希 (Maurice Ullrich)，自鮑涅離去後法國留在共同體的資深代表，却於是日參加五國外長和委員會委員的午宴。十二月二十二日，戴高樂在法國總統選舉獲得連任後，法國政府終於接受五國的邀請，參加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十八日和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在盧森堡舉行的部長理事會特別會議。

戴高樂為何在當選連任確定後才想恢復談判？依照我們的看法，這也是他在外交權術運用方面，頗為高明的一招。共同體委員會利用戴高樂準備競選連任之時，在共同農業政策財政問題一事，節外生枝，有意利用與共同市場幾乎密不可分的法國工業和農業界的影響力，壓迫戴高樂，使他同意在共同體的經濟和政治聯合方面向前邁進一步。對於委員會此一計謀，戴高樂深惡痛絕。出乎委員會意料之外，他不但不妥協，反而使談判成爲僵局，最後利用大選後民意的支持，以做爲討價還價的本錢。

四、危機的結束與影響

歷經七個月的危機，到了一九六六年一月底方告結束。那麼此一危機到底如何結束，爲何能結束，以及帶來何種影響等問題，也有詳加探討的必要。

1. 危機的結束

多數票決、委員會擅權和農業財政的安排，爲造成此一危機的主要原因。如要結束危機，就非先解決這些問題不可。法國外長墨維勒出席一月十七—十八日的理事會時，態度十分強硬，一定要馬上解決前面兩個問題，至於農業財政問題，則可延至四月一日解決。

解釋法國爲何反對多數票決原則時，墨維勒說，談及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問題時，惟有一致同意，才是政治上可行之法。法國政府因此建議，在不涉及羅馬條約的修訂，六國之間達成一項政治協議，如果任何會員國基於該問題對本國的重要性，而做此項要求時，理事會應避免多數票決。其他會員國拒絕任何可能賦予某一會員國永久否決權的正式決定；然而，她們覺得在實際執行方面，對於重要問題已經常採取一致通過方式，因此這根本不成爲問題。在一月二十九日，理事會達成下列協議：⑥

(1) 當對一個或一個以上會員國非常重要的問題付諸討論時，理事會的成員，在一段合理的期間內，盡量達成能為理事會全體成員所接受的協議，而不損及其相互利益和羅馬條約第二款之共同體之利益；

(2) 法國代表團認為，面臨非常重要的問題時，討論必須繼續，直到達成一致的協議為止；

(3) 六國代表團特別提及，一旦無法達成完全的協議，對於應該如何做的看法，會有分歧；

(4) 它們認為，此一分歧並無礙於共同體工作的正常進行。

在這種情況下，五國維持條約所規定的多數票決，但是某種主要決定有違法國的意願時，法國可能再製造另一次危機。

有關委員會的角色，及其與理事會的關係，墨維勒提出下列十項建議，以供討論：^⑥

- (1) 在向理事會提出有關共同體行動特別重要的建議案之前，應先徵詢會員國政府的意見；
- (2) 委員會的建議案在向理事會提出之前，不應該洩露給歐洲議會或公眾；
- (3) 在任何政策範圍內，賦予委員會的行政權力，應明確規定，不讓它有隨意處理的餘地；
- (4) 委員會對於共同體政策的指示，不應載明各會員國在實施時的細節；
- (5) 理事會應再言明其在外交關係方面的特權，特別是有關到任證書的接受；
- (6) 非會員國的進入委員會，應先告知理事會；
- (7) 理事會應決定共同體與國際性組織的關係之本質和範圍；
- (8) 委員會的委員在對外言論方面，應注意政治的中立；
- (9) 共同體的情報方針，應是理事會和委員會的共同責任；
- (10) 理事會對於委員會的預算應嚴加管制。

儘管墨維勒的這些建議受到其他會員國，尤其是德國的激烈批評，^⑦理事會還是達成下列有關它與委員會關係的決議：^⑧

(1) 委員會在決定一項特別重要的建議案之前，除非可能影響到委員會經條約授予的創制權，否則應先透過常駐代表 (Per-

manent Representatives) 與會員國政府保持適當的聯繫；

(2) 委員會向理事會和會員國所提的建議案和其他正式法案，只有在後者已正式注意到，並擁有該文件時，方得公開。「官方公報」(The Official Gazette) 須加以安排，使之與具有約束力的立法性法案有別；

(3) 致共同體的非會員國代表團團長的到任證書，應遞給爲此而聚會的理事會主席和委員會主席；

(4) 有關非會員國向理事會或委員會所做的任何有關基本問題的建議，兩個機構將迅速而充分的彼此告知；

(5) 在第一六二款的應用範圍內，理事會和委員會將會商，依據條約第二二九款，委員會可能與國際性組織建立的任何聯繫之可取性、程序和本質；

(6) 理事會和委員會之間有關共同體情報方針的合作將加強，因此「報業和情報服務處」(Pres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的計劃，應聯合擬訂和實施；

(7) 在爲編列和實施共同體預算的財政法規的架構中，理事會和委員會將詳細說明，增加對共同體支出之承兌、認可和執行的管制效果的方法。

從以上「理事會和委員會之間密切合作」的七項方案看來，原爲獨立機構的委員會，其權力已大不如前。這是它得罪戴高樂所得的報應。

至於農業財政問題的解決，比墨維勒所訂的時間表晚了一個多月。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六國方在農業政策的財政章程方面達成協議。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起，所有農產品在共同市場的範圍內，將在無關稅的情況下流通。^{②0}

一九六二年決定成立，後來又發生變卦的「歐洲農業指導和保證基金」(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在危機結束之後，經過漫長的討論(從二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四日)，終於在細節方面達成協議。從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起，此一負責對農民補助的機構，其經費來源，一部份來自個別會員國，另一部份來自農產品進口關稅。^{②1}

2. 危機結束的原因

法國國內對戴高樂施加的壓力，以及法國在共同市場的五個伙伴盡量委曲求全，爲危機不會繼續惡化的兩大原因。

共同市場並未改變法國，但却使法國更富有競爭力，並強迫法國的企業界懷有更遠大的計劃。^{②2}已經習慣於共同市場的法

國工業界，不願因危機造成共同市場的解體；生產過剩的法國農民也對共同市場寄以莫大的希望。^③因此，戴高樂的「缺席」政策在法國國內並不孚衆望。

農會帶頭要求回到布魯塞爾。在八月，農業的領導人告訴龐畢度總理，他們認為委員會在七月所提出的妥協方案，可做為恢復布魯塞爾談判的基礎。他們同時還寫信給參、衆兩院的所有議員，請求後者對政府施加壓力，使之對其歐洲政策舉行辯論。在九月，全國農會聯盟主席卡發累利（Gerard de Calfarelli）提出警告，他說農民將被告知「目前的政策對其收入、其生活水準和在歐洲的未來之影響……很顯然地，他們的焦慮和困惑，這種現行政策的結果，將是他們如何投票的一個決定性因素。」^④工會也以各種不同的理由反對政府的政策。

來自國內農工團體的壓力，並未立即使戴高樂改變其「缺席」政策。由此可知，戴高樂似乎有點意氣用事，而且對自己的做法太過於自信，以致於在總統大選時馬前失蹄，未能在第一次投票就順利當選。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第一次投票，戴高樂只得百分之四十三點七一的選票，未超過半數。雖然在第二次投票，以百分之五十四點五的票數得以當選連任，但是比起以前的選舉或全民複決，他的聲望已大為削弱。^⑤根據民意測驗，戴高樂這次選舉的不如意，失去大部份的農民票為其原因之一。^⑥此一情況當然會令他有所警惕，而改變自己的做法。因為如果再繼續堅持下去，不但法國的農民和工業家將蒙受很大的損失，就是流入法國的外國資本也會受到影響。^⑦

除了法國民意對戴高樂的壓力之外，共同市場其他會員國的委屈求全也是危機能夠解決的原因。

當戴高樂發除非法國的要求獲得滿足，否則要脫離共同市場的威脅時，其伙伴面臨着最後的抉擇：適應，或者共同市場的崩潰。^⑧此時，五國的意見並不一致。荷蘭有意公然蔑視法國，而且為賀斯坦的委員會辯護。比利時外長史巴克，雖贊成在最後階段的歐洲政治聯合，但在目前的衝突中還是支持法國。盧森堡也和比利時態度一致。意大利中間偏左的政府在國內已自顧不暇。德國雖然經濟方面較法國強大，但也無法為政治理由而與法國決裂。戴高樂在此不久前跟莫斯科的勾結，猶如對德國的一項警告，法國可能犧牲德國的重大利益，而與蘇聯和東歐達成協議。^⑨因此，大致說來，法國在共同市場的伙伴，並不希望危機惡化，而且盡量設法讓法國重新參與共同體的活動。

歐洲共同市場數年來的發展，已使六個會員國的經濟密切結合在一起，事實上，根本不可能分開，誠如一位共同市場總部的官員所說的：「經濟上，共同市場或許已經超過無法返回原處之點。」^⑧

基於此一觀點，六國的職業性團體一致抗議法國的行動。對於它們來說，返回純粹的國家經濟結構是完全不可思議。這些團體的會員遍佈六國的三百餘個共同體職業組織，包括工業貿易協會、農會、工會、商會、運輸同業公會等等。它們曾建立一致的政策和採取共同的行動，並且曾利用自己的行動推展六國的統一工作。^⑨

從經濟觀點來說，法國也不利於脫離共同市場。因為法國農產品之中，約有一半輸往共同市場的其他五個會員國；何況，依據共同市場的計劃，在未來幾年，約有三分之二預定支持農產品的經費，將填滿法國農民的荷包。^⑩根據瑞士權威人士的說法，共同市場的崩潰可能使法國的經濟發展更加遲緩，甚至帶來嚴重的經濟衰退。^⑪

同時，由於五國不願見到共同市場解體，法國已不再有繼續留在外面，而使共同市場癱瘓的力量。戴高樂深深瞭解，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如果繼續其抵制的政策，可能會失多於得。^⑫萬一共同市場的五個會員國，與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取得諒解，法國在國際市場上就難於從事有利的競爭。^⑬

3. 危機的影響

經過幾番折衝，歐洲共同市場總算渡過此一歐洲經濟組織空前未有的大風暴，其影響有三：

(1) 法國對協議尚表滿意——雖然有些學者認為法國從五國中所得到的只是一些含混不清的協議，^⑭但是大體上，法國農民、工業界和工會，皆對法國能再度從共同市場獲益而欣喜。「歐洲派人士」(Europeans)如孟奈(Jean Monnet)、佛爾(Mawrice Faure)和布呂溫(René Pleven)，認為這些協議是共同體組織的穩定性和法國伙伴的善意之證明。「戴高樂派人士」(Gaullists)認為這些協議，是對「超國家主義份子」(supranationalists)的一項真正勝利。戴高樂派報紙「國家報」(La Nation)如此寫着：「法國將在二月重返六國的議席上，因為，基本上，五國已被勸服接受其觀點。」^⑮

這次因替法國農民爭利益而造成的危機，其結果是否令他們皆感滿意？他們那些保守的領導人物和政府，向來視經濟結合的歐洲為一樂園。在這裏，法國肥沃的土地和能幹的農民，將找到一個相當廣大的市場。法國農民突然發現事情並沒那麼簡

單。

對於穀類的生產者來說，遠景相當光明。一個穀類共同市場已經建立，價格也可能因而上漲。但是所謂共同市場的周圍地帶，農地狹小，而且遠離市場中心，因此反而處於不利的地位。例如不列塔尼(Bretagne)農民所生產的雞，比荷蘭和比利時的競爭者，更遠離巴黎，因而在自己國家的市場內，無法與後者競爭。這些農民的生活水準當然不可能提高。他們對於歐洲共同市場頗感失望。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不列塔尼的根柏爾(Quimper)所發生導致一百七十九個警察和一百餘位農民受傷的大暴動，就是這種失望和不滿的具體表現。⁶⁸

(2)德、法兩國的關係陷入低潮——德國認為此次危機已損及「六國和諧的氣氛」，並希望「對於法國的不信任能逐漸消除」。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歐哈德總理訪問巴黎，同時參加法、德兩國第六次高階層會議，但是對消除不信任的工作，還是做得不夠。兩國的關係已不如以前和諧。⁶⁹

(3)協議造成若干隱憂——在法國和西德，許多人覺得高價格水平，將導致通貨膨脹，家庭農場似乎比以往更受到威脅，法國工業將因工業產品關稅和配額的廢除比羅馬條約所訂的日期提早十八個月而蒙受打擊。法國的「缺席」政策促使一個工業與農業共同市場，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完成，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但是一九六六年一月盧森堡的妥協却令人覺得，一個超國家歐洲的實現為期尚遠。⁷⁰

五、結 論

戴高樂那愛國、自負和專權的個性，在一九五—六六年歐洲共同市場的危機期間，再度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次危機起因於戴高樂要替法國農業在共同市場中，爭一席之地，以解決法國農業生產過剩的問題，進而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

為共同農業問題，戴高樂曾製造過幾次危機，但因皆侷限於經濟因素，所以都能在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危機很快地宣告解除。一九六五—六六年的危機，最初也是因經濟問題而起的，後來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共同市場的行政機構，在未向各會員國政府徵詢意見之前，即先對歐洲議會和新聞界，發表該會所擬的方案，也就是主張共同體的財政自主和理事會採取多

數票決原則，使歐陸六國從經濟聯合逐漸走向政治聯合。

委員會的建議案，使原先的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問題。假如委員會的主張獲得實現的話，法國的部份主權將移交給共同市場，而且戴高樂再也不能以否決權，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意願和為法國爭取權益。法國在共同市場中的領導地位，也將受到影響。

這種「超國家主義」的主張，與戴高樂法國至上的國家主義互不相容；何況委員會自行其是的做法，更讓他無法忍受。難怪他會採取所謂「缺席」政策，使歐洲共同市場連續癱瘓了七個月。

法國國內，尤其是來自農民團體的壓力，以及法國在共同市場的五個伙伴的忍讓，使法國重返理事會會議席上。歷經為期兩週的談判，其結果大體上還能滿足戴高樂的要求。理事會在重要問題方面，有關會員國仍享有否決權，委員會的權力受到較嚴格的限制，歐洲議會不再有染指共同體財政權的機會，而且農業財政問題也達成協議。換言之，法國仍保有完整的主權，戴高樂也可以繼續左右共同市場。

附 註

① Roy Pryce, *Customs Union and Economic Union in the EEC* (Calmann, Western Europe, A Handbook, Frederick A. Praeger, N. Y., 1967), p. 585.

② 理事會由歐洲經濟共同體會員國部長級代表組成，為該組織的權力機構。

③ 委員會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執行機構。

④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957-58*, vol. 163, p. 225.

⑤ *Ibid.*

⑥ 孟修為荷蘭人，曾連任好幾屆歐洲經濟共同體委員會副主席，以他的努力和卓越的技術，使原先六個分開和各自有別的國家性農業政策，

在種種困難中，逐漸結合在一起。

⑦ F. Roy Willis, *France,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1945-196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8), p. 289-290.

⑧ 以耕種面積來比較，法國也幾佔半數，為三千四百五十萬法畝 (hectares)，意大利為一千九百四十萬法畝，西德為一千三百五十萬法畝，荷蘭為二百二十萬法畝，比利時為一百六十萬法畝，盧森堡為十三萬法畝 (見 Marcel Baleste, *L'économie française*, Masson & Cie, Paris, 1972, P. 41)；法國農民平均擁有三十三畝地，而共同市場會員國平均數只有二十畝。(見 Kulski,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p. 217)

- ⑥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spoir, Le Renouveau 1962-1962 Livre de Poche, Pion, Paris, 1970*, p. 235-236 ; ⑦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65*, (Pion, Paris, 1970) p. 181, 德高樂與德國在六二之的糧食與國外進口。
- ⑧ Willis, op. cit., p. 287.
- ⑨ Ibid., p. 288.
- ⑩ Ibid., p. 288-289.
- ⑪ Brian Crozier, *De Gaulle, the Statesman* (Eyre Methuen, London, 1973), p. 554; De Gaulle, *Le Renouveau*, p. 237.
- ⑫ The General's Boycott, *Newsweek*, July 19, 1965.
- ⑬ De Gaulle, *Le Renouveau*, p. 237-238.
- ⑭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September 15-22, 1962, P. 18976.
- ⑮ Ibid.
- ⑯ Willis, op. cit., p. 290.
- ⑰ Pryce, op. cit., P585-586; Willis, op. cit., P338-339.
- ⑱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September 15-22, 1962 P. 18976-18977.
- ⑲ Ibid., p. 18977
- ⑳ Ibid.
- ㉑ Willis, op. cit., p. 292.
- ㉒ Ibid., p. 291.
- ㉓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 395 ; David Schoenbrun, *The Three Lives of Charles de Gaulle* (Athens, N.Y., 1966), p. 346; Pierre Viasson-Ponté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Gaullienne, T. II* (Fayard, Paris, 1971), p. 211-212.
- ㉔ Willis, op. cit., P. 339.
- ㉕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July 3-10, 1965, p. 20829. ① 糧食出口。
- ㉖ Ibid.
- ㉗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20829.
- ㉘ Ibid.
- ㉙ Pryce, op. cit., p. 585.
- ㉚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20829-20830.
- ㉛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 393-394; p. 444-445.
- ㉜ Willis, op. cit., p. 345.
- ㉝ Is De Gaulle Killing the Common Market ?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23, 1965.
- ㉞ Edward L. Morse,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dependence in Gaullist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 Y., 1973,) p. 265.
- ㉟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September 3-10, 1966, p. 21591.
- ㊱ 歐洲議會源自「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的監督機構——「共同議會」(Common Assembly)，其議員名額之分配為法、德、意各十八人，比、荷各八人，盧森堡四人，共計七十八人。會址設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內部。後來議員名額增至一百四十二人，並易名為「歐洲議會」，為「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之監督機關。

- ②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21591-21592.
- ③ Ibid., p. 21592.
- ④ End of Europe's Big Dream ? What De Gaulle's Revolt Means,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9, 1965.
- ⑤ 歐寬賜・歐洲共同市場（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臺北・民國五十七年），頁二八四—二八七。
- ⑥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 397.
- ⑦ Gaston Defferre, De Gaulle and After (The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66), p. 439.
- ⑧ Plain Talk by De Gaulle, Newsweek Nov. 1, 1965.
- ⑨ Willis, op. cit., p. 342.
- ⑩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September 3-10, 1966 p. 21592.
- ⑪ Willis, op. cit., 343.
- ⑫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21592.
- ⑬ Morse, op. cit., p. 265.
- ⑭ Is De Gaulle Killing the Common Market ?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23, 1965; Marwan Jabri, France and the Common Market (Current History April 1966), p. 229.
- ⑮ The General's Boycott, Newsweek, July 19, 1965.
- ⑯ Willis, op. cit., p. 343; Common Market: A Noël from France, Newsweek, December 30, 1963.
- ⑰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 370.
- ⑱ Willis, op cit., p. 343-344.
- ⑲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September 3-10, 1966 p. 21592.
- ⑳ Ibid; Willis, op. cit., p. 345.
- ㉑ W. W. Kulski,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N.Y., 1966) p. 209.
- ㉒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21592.
- ㉓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 393-398.
- ㉔ The General's Boycott, Newsweek, July 19, 1965.
- ㉕ If De Gaulle Could Have His Way,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13, 1965.
- ㉖ Kulski, op. cit., p. 210.
- ㉗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21593-21594.
- ㉘ Ibid., p. 21594.
- ㉙ Ibid.
- ㉚ Willis, op. cit., p 349.
- ㉛ 回註六六。
- ㉜ Georges Dupoux, La France de 1945 à 1969 (Colin, Paris, 1972), p. 286;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p. 21731.
- ㉝ Shepard B. Clough,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2ed. (新月・臺北，一九六八)：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兩年期間的經費，全部由共同市場會員國分攤，其比例如下。

	1965-66 %	1966-67 %	1967以後 %
比利時	7.95	7.95	8.1
西 德	32.58	29.26	31.2
法 國	32.58	29.26	32
意大利	18	22	20.3
盧森堡	0.22	0.22	0.2
荷 蘭	9.58	9.74	8.2

①The N. Y. Times, Dec. 4, 1965.

②Kulski, op. cit., p. 210.

③Willis, op. cit., p. 346.

④Jacques Chapsal,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940* (PUF, Paris, 1972), p. 649.

⑤Will De Gaulle Be Easier to Live With Now ?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0, 1965.

⑥The General's Boycott, *Newsweek*, July 19, 1965.

⑦Morse, op. cit., p. 264.

⑧Is De Gaulle Killing the Common Market ?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23, 1965.

⑨Ibid.

⑩Pryce, op. cit., p. 590.

⑪同註七九。

⑫End of Europe's Big Dream ? What De Gaulle's Revolt

Means,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9, 1965.

⑬Morse, op. cit., p. 272.

⑭Kulski, op. cit., p. 210-211.

⑮Marwan Jabri, *France and the Common Market* (Current History, April 1966), p. 231.

⑯Willis, op. cit., p. 350-351.

⑰De Gaulle Studies Farmer Violence (*The N Y Times*, Oct 4, 1967)

⑱Willis, op. cit., p. 351.

⑲Ibid., p. 353.

參考書目

- Beloff, Nora, *The General Says NO: Britain's Exclusion from Europe*, (Penguin, London, 1963; Peter Smith, Gloucester, Mass., 1964)
-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 Bulletin of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Commission, Brussels, Monthly)
- Campbell, Alan, *Restrictive Trading Agreements in the Common Market: Texts and Commentaries*, (Stevens, London; Rothman, South Hackensack, N. J., 1964)
- Calmann, John (ed.), *Western Europe, A Handbook*, (Frederick A. Praeger, N. Y., 1967)

- Calleo, David, *Europe's Future: The Grand Alternatives*, (Horizon Press, N. Y., 1965)
- Camps, Miriam, *Britain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955-6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N. Y., 1964)
- — — — — *What Kind of Europ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 N. Y., 1965)
- Chapsal, Jacques,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940*, (PUF, Paris, 1972)
- Clough, Shepard B.,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2ed.* (蘇巴・蘭特・武國岡中社)
- *Common Market: A Noël from France*, *Newsweek*, December 30, 1963)
- Crozier, Brian, *De Gaulle, the Statesman*, (Eyre Methuen, Loncon, 1973)
- De Gaulle, Charles, *Mémoires d'espoir, Le Renouveau, 1958-1962*, (Livre de Poche, Plon, Paris, 1970)
- — — — —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lon, Paris, 1970)
- Deniau, Jean F., *The Common Market* (Barrie and Rockliff/Pall Mall Press,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N. Y., 3rd. ed. 1963)
- Despicht, Nigel, *Policies for Transport in the Common Market* (Lambarde Press, London, 1964)
- Defferre, Gaston, *De Gaulle and After* (The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66)
- *De Gaulle Studies Farmer Violence* (The N. Y. Times, Oct. 4, 1967)
- Dupoux, Georges, *La France de 1945 à 1969* (Collin, Paris, 1972)
- *EEC Repor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Six* (Brussels, Feb. 1963)
- *Eighth General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ty* (EEC Commission, Brussels, 1965)
- *Europe in a Shrinking World* (Economist, London, May 14 1966)
- *European Community* (European Community Information Service, Monthly)
- *End of Europe's Big Dream ? What de Gaulle's Revolt Means*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9, 1965)
- Forsyth, Murray, *Cartel Policy and the Common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1962)
- — — — — *Towards a Common Economic Policy for EE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 1964)
- *General's Boycott* (The), (Newsweek, July 19, 1965)
- Gladwyn, Lord, *The European Idea*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N. Y., 1966)
- *Guide to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 (Lond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formation Service, revised ed. 1965)

- Hallstein, Walter, *United Europ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2)
- Is de Gaulle Killing the Common Market?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23, 1965)
- Jabri, Marwan, *France and the Common Market* (*The Current History*, April 1966)
-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quarterly)
-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Keesing's Publication Limited of London)
- Kitzinger, Uwe, *The Challenge of Common Market*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62)
- Kohl, Wilfrid L., *French Nuclear Diplom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 J., 1971)
- Kulski, W. W.,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Syracuse, 1966)
- Lindberg, Leon N.,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 1963)
- Mayne, Richard, *The Community of Europe* (Gollancz, London, 1962; W. W. Norton, N. Y., 1963)
- Morse, Edward L.,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dependence in Gaullist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 Y., 1973)
- Newhouse, John, *Collision in Brussels: The Common Market Crisis of June 30, 1965* (W. W. Norton, N. Y., 1967)
- — — — De Gaulle and the Anglo-Saxon (Viking, N. Y., 1970)
- New York Times* (The), Dec. 4, 1965.
- Oudemans, G., *The Draft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Stevens, London; Bender, Matthew, N. Y., 1963)
- Opera Mundi-Europe* (Weekly report on the economy of the Common Market, European Intelligence Ltd., Tunbridge Wells, Kent)
- Paklons, L. L. (ed), *European Bibliography*, Cahiers de Bruges, No. 8, de Tempel Bruges, 1964.
- Passeron, André, *De Gaulle parle t. I*, (Plon, Paris, 1962); t. II, (Arthème Fayard, Paris, 1966)
- Pinder, John, *Europe against de Gaulle*, (Pall Mall,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N. Y., 1963)
- Pryce, Roy,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Marshbank for the Federal Trust, London, 1962)
- Reynaud, Paul,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arles de Gaulle* (Translated by Mervyn Savill, The Odyssey Press, N. Y., 1964)
- Schoenbrun, David, *The Three Lives of Charles de Gaulle* (Atheneum, N. Y., 1966)

- Shanks, Michael & Lambert, John, Britain and New Europe (Chatto and Windus, London, 1962); issued in the U.S. as "the Common Market, Today-and Tomorrow" (Frederick A. Praeger, N.Y., 1963)
-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Brussels, 1957)
- Tracey, Michael, Agriculture in Western Europe, (Cape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N.Y., 1963)
- Viasson-Ponté, Pierre,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Gaullienne, t. II (Payard, Paris, 1971)
- Weil, Gordon L. (ed.), A Handbook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all Mall Press, London; F.A. Praeger, N.Y., 1965)
- Willis, F. Roy, France,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1945-196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Oxford, N.Y., 1968)
- 戴寬賜，歐洲共同市場（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臺北，民國五七年）
- 王雨桐，歐洲共同市場面面觀（銘傳學報七期）
- 談子民，戴高樂與美國之背離（撰者自刊，臺北，民國五八年）